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重瓣花朵”理论

陈伟驹

谈及严文明先生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判断，人们首先会想到他的“重瓣花朵”模型。他把中国新石器文化区的结构比喻成一朵花：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围绕中原文化区的甘青、燕辽、山东、江浙和长江中游文化区为“第一重花瓣”，更外围的区域为“第二重花瓣”。这种富有诗意又准确反映中国新石器文化格局的比喻一直备受学界瞩目。

这一“重瓣花朵”模型最早发表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一文中。这是严先生引用率最高的一篇文章。由于该模型强调中原的“花心”和特殊地位，一般认为其与苏秉琦更早提出的“区系类型”学说略有不同(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有时会被归入“中原中心论”或“新中原中心论”的行列(张学海：《新中原中心论》，《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

当然，论者基本都注意到，严先生的“重瓣花朵”格局是建立在中国史前或新石器文化多元说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他的文章中有明确的表述。比如，他批评，“在一个时期，某些学者又过分强调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倾向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更发展成了所谓中原中心论，把其他地区的文化成就都看成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似乎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他还提及，“中国史前文化并非出于一源”，“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但是他确实又强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原的文化比较发达，其次是它的周围地区，再次是边境地区。但文化发展是能动的，所以这种差别在不同时期也是变动的”。这一表述虽然略微突出中原史前文化相对较发达，但又强调这种差别是随时间变动的。应该说，这种观察大体还是符合中国史前文化发展事实的。

在这篇文章中，严先生真正突出中原文化区特殊地位的地方在于强调其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领先性。他提出，“由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处于核心位置，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个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文中类似的表述还有，“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而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文明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其次是它周围的各文化区，第三层即最外层各文化区进入文明的时间甚晚”。

这种认识是特定学术背景的产物。这篇论文最早在1986年6月在美国弗吉尼亚艾尔莱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写作时间可能更早。在当时，

反映周边地区社会复杂化或文明起源个别因素的重要遗存尚未发掘或公布。在已有的资料中，严先生关注到中原龙山时代陶寺遗址出现了随葬品达一两百件的大墓，同时注意到良渚文化个别大墓(如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等遗址)随葬较多的玉璧、玉琮，但是由于将良渚文化视为“龙山时代”，其与中原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至少无明显内容上和時間上的优势。

实际上，早在1959年，大汶口遗址就发现一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墓。这些墓葬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及庙底沟二期文化。早在1965年，苏秉琦先生即据此提出，在仰韶文化后期，东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中原地区，并对中原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严先生在论述中原与周边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水平高低，没有突出大汶口墓地的材料。

1986年至1990年间，良渚文化的瑶山、反山人工堆筑的高台祭坛及墓地、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家群、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F901“原始殿堂”、龙山文化朱封大墓以及石家河古城等遗存陆续被发掘或公布出来。此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良渚文化主体年代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即仰韶文化晚期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如牟永抗：《试论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年；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

1992年，综合新的发现及研究进展，严文明先生发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首先对良渚文化的年代做了部分调整，即将良渚文化早期置于仰韶文化后期(含庙底沟二期)，但仍将良渚文化晚期纳入龙山时代。其次提出仰韶文化后期以来的中原和周边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是相当的。文中强调，在仰韶文化后期，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文化发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会内容也是相通的”。对于龙山时代，严先生专辟很长的一段话来讨论这一问题：

“中原地区是夏商周文明先后发生和发展的地区，按照逻辑推理，中原龙山文化似应比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更高，但考古发现的情况并不能证明这一点。究其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是考古工作做得不够，某些代表当时最高发展水平的遗迹和遗物还没有被发现；二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本来并不比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更高，那种中原文化从来就比别处发展水平高的观点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夏商周文明的产生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既有当地历史文化的基础，也有邻

近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激发，并不完全是当地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中原龙山文化似也不会比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更低，否则在那样的基础上产生夏商周文明是不大可能的，已有的一些考古发现也大致能说明这一点。”

在这段话中，严先生以一种特殊“否定”的表达方式，谨慎地提出，龙山时代周边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相当，并以“先进文化”的身份“影响和激发”了中原地区，催生中原地区夏商周文明。这种对中原地区史前地位的判断，显然与1987年强调中原的核心地位有着较大差异。此时，在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上，也不再强调中原地区“最早进入”或“起领先和突出作用”，而是认为“中国文明不是单元而是多元起源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严先生虽然将良渚文化早期年代明确提前，但是在比较时，仍将良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置于龙山时代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周边地区在文明起源出现时间上的优势。

到了1997年，严先生在写作《东方文明的摇篮》时(载《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史前时期中原及周边地区地位差异问题又有了新的表述。他说，“我过去曾将中国史前文化形容为一个重瓣花朵，因为在史前时期，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虽不明显，但地理位置还是比较适中；而山东地区、燕辽地区、江浙地区和长江中游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中原相比都很接近。如果说当时确实存在某种核心的话，那就应该是包括以上各区在内的重瓣花朵的内圈，也就是黄河、长江这身两大河流域。燕辽地区现在虽然不属于黄河流域，但历史上黄河是从现今的海河入海的，那时的黄河流域自然也可以把燕辽地区包括在内。这是一个大的核心”，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一个大体上是平等的多元一体格局正向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发展”。

由此可见，此时严先生对于史前时代中原“花心”地位的判断，仅保留“地理位置”上的意义，不再突出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这层含义，而是强调中原和第一重花瓣的区域都是核心，而且是“平等”的关系。只有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才成为独一无二“的核心”。这种提法，实际上非常接近后来许宏的观点，即认为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中心才开始形成(《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

综上所述，严文明先生有关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判断，是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推进不断发生变化的。在论及相关问题时，不应把目光局限于1987年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型，而应以发展的眼光把握其具体观点的变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腰坑葬是指在墓的底部(多在墓主人的腰部下面)另挖一个小坑，坑内殉人、狗或放置随葬品的葬俗，史前时期开始出现，商周时期最为流行，历史时期仍有延续。史前时期的腰坑葬最早发现于仰韶文化晚期，在豫东地区的尉氏椅圈马遗址中发现一座腰坑墓葬，墓主人腰部下方设有腰坑，坑内放置一件陶钵。屈家岭文化至后石家河文化这一阶段，腰坑墓葬数量增多，主要分布于汉水中游地区，在浙川黄棟树、浙川全岗、郧县青龙泉、房县七里河、秭归县旧州河等遗址均有发现。浙川下寨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史前腰坑墓葬数量最多的遗址，该遗址所发现的腰坑墓葬形制特点、腰坑内随葬品组合及摆放方式等，对于探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腰坑葬俗具有重要价值。

下寨遗址腰坑墓葬发现概况

下寨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滔河乡下寨村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时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至2013年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仰韶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的墓地一处。墓地共清理出墓葬133座，仰韶文化时期墓葬59座，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74座，其中发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腰坑墓34座，均为土坑竖穴墓，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29座墓向朝西，1座朝东和4座朝北。腰坑墓的腰坑形制特点基本一致，位于墓主人腰部(靠近盆骨处)下面，平面形状为圆形或椭圆形，大小仅可容纳随葬器物，绝大多数腰坑墓仅设置一个腰坑，仅M145发现两个腰坑，分别位于墓主人腰部及股骨下方，腰部下方的坑内竖置一件小陶罐，股骨下方的坑内竖放陶壶与陶钵组合。所发现腰坑墓的腰坑内一般叠置两件陶器，坑底部竖放一件泥质陶壶，其上正放一件底部刻意穿孔的陶钵(仅1座墓葬腰坑内放置陶壶与陶钵组合)。

从墓葬随葬品数量方面看(包括腰坑内随葬品)，下寨遗址发现的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中，有随葬品的腰坑墓数量远多于有随葬品的非腰坑墓，同时腰坑墓的随葬品数量也多于非腰坑墓。检索报告可知，墓向朝西的墓葬中发现有随葬品的墓葬共35座，其中非腰坑墓6座，腰坑墓29座；此类墓葬共出土78件随葬品，其中腰坑墓出土至少64件。墓向朝东的墓葬中仅发现1座有随葬品的墓葬为腰坑墓，随葬品共2件。墓向朝北的墓葬中发现有随葬品的墓葬共7座，其中腰坑墓4座，非腰坑墓3座；此类墓葬共出土43件随葬品，其中腰坑墓出土至少27件。腰坑墓随葬品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差异性，多数腰坑墓的随葬品在2~3件，如M239仅随葬陶壶和陶钵，随葬品最多的为腰坑墓M207，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墓主人为50岁左右男性，除腰坑内随葬的陶壶、陶钵外，还随葬石钺、石凿、石环、陶罐、泥器、蚌器等16件器物，墓底还发现有葬具痕迹。可见，下寨遗址腰坑墓主人的整体财富要高于同时期的非腰坑墓，但有无腰坑也并不是衡量墓主人财富的唯一标准。

与汉水中游地区其他腰坑墓葬的关系

汉水中游地区除淅川下寨遗址外，发现史前腰坑葬的其他遗址主要有：河南淅川黄棟树遗址，共发现3座屈家岭文化晚期的腰坑墓，腰坑底部均竖放1件陶罐，罐口叠置1件陶豆或陶片，其中2件陶罐内藏有婴幼儿骨骼。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共发现腰坑墓10座，其中2座属于屈家岭文化晚期，8座属于石家河文化时期，腰坑形状都为圆形或椭圆形，坑内底部皆竖放1件陶罐或高领罐，罐口上大都叠置1件陶钵(底部穿孔)或陶碗，个别陶罐上面未放置器物；其中2件陶罐内藏有婴幼儿骨骼，1件陶罐内藏有儿童骨骼。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发现1座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腰坑墓，腰坑为椭圆形，坑内底部竖放2件陶罐，两个罐口中间叠置1件底部穿孔的陶钵；另有1座同时期墓葬，虽无腰坑，但墓主人盆骨处随葬有陶罐和底部带孔的陶钵，两件器物上下叠置。湖北秭归县旧州河遗址，发现1座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腰坑墓，腰坑为圆形，坑内放置1件高领卷沿罐，罐内置一件泥质陶碗(碗中放一条草鱼)。湖北郢县梅子园遗址，共发现7座石家河文化时期腰坑墓，有2座墓的腰坑形状为长方形，其余为圆形或椭圆形，坑内底部竖放1件陶罐或高领罐，罐口叠置1件陶钵或陶盆，仅1座腰坑墓的陶罐上未放置器物。河南淅川全岗遗址，发现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腰坑墓各1座，腰坑内底部均竖放1件陶罐，罐口叠置1件陶钵或陶盆。

从上述情况来看，下寨遗址发现的腰坑墓与汉水中游地区其他遗址同类遗存既有共同特征，也有差异性。共同特征方面，腰坑的形制特点一致，位置都在墓主人腰部(靠近盆骨处)下面，形状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坑内大小仅容下随葬器物。坑内随葬器物都以两个上下叠置的陶器为主，下部为容器，上部多为盛放器。差异特征方面，主要体现在腰坑内随葬器物的不同。下寨遗址的腰坑底部都竖放陶壶、壶口叠置底部穿孔的陶钵，陶壶和陶钵内未发现其他随葬物。其他遗址的腰坑底部均竖放陶罐，罐口叠置陶钵(多数底部有穿孔)、碗、盘或陶片等器物，个别腰坑内除器物组合外还发现有猪头骨或陶杯等随葬品。此外，腰坑内也发现有仅竖放1件陶罐或2个陶罐和1件陶钵的现象。最为特殊的是，其他遗址个别

浙川下寨遗址史前腰坑葬刍论

曹政权

腰坑墓的腰坑内陶罐中还发现有婴幼儿或儿童骨骼，形制与瓮棺相似，有学者认为这类腰坑墓是瓮棺和成人的合葬墓，称为“瓮棺腰坑合葬墓”。

结合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腰坑葬的特征不难发现，该区域史前腰坑葬的腰坑与瓮棺葬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水中游地区发现最早的瓮棺葬是在仰韶文化早期下王岗遗址，到石家河文化时期仍然盛行。该区域史前瓮棺葬的墓坑平面形状多为圆形、椭圆形、方形等，形状大小仅略大于葬具。葬具一般为1~3件，分为装殓器与棺盒，装殓器物多为陶罐，也有瓮、鼎、釜、尖底瓶等器物，棺盒多为钵、碗、盆、豆盘、陶片等器物。汉水中游地区其他遗址发现的腰坑墓，其腰坑的形状特征和坑内随葬的陶罐和陶钵、陶碗及陶片等器物组合，同该地区瓮棺葬的瓮棺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尤其个别腰坑内的陶罐中还发现有婴幼儿骨骼。可见，腰坑内随葬的器物组合实为瓮棺。下寨遗址史前腰坑墓的腰坑内随葬的陶壶和陶钵，虽不具备装殓尸体的实用功能，但坑底放置陶壶、壶口上叠置底部带孔陶钵的器物组合及其摆放方式，仍具有浓厚的瓮棺风格，是一种冥器化的瓮棺，更多凸显的是其代表的内涵。

总体来看，下寨遗址的腰坑葬与汉水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腰坑葬俗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尽管腰坑内随葬器物的组合

不同，但都体现出完整的瓮棺形制。因此下寨遗址发现的腰坑葬应是在继承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腰坑葬俗核心观念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演变，葬俗形制更具统一性，弱化了腰坑的实用功能，凸显其象征意义。

下寨遗址腰坑葬功能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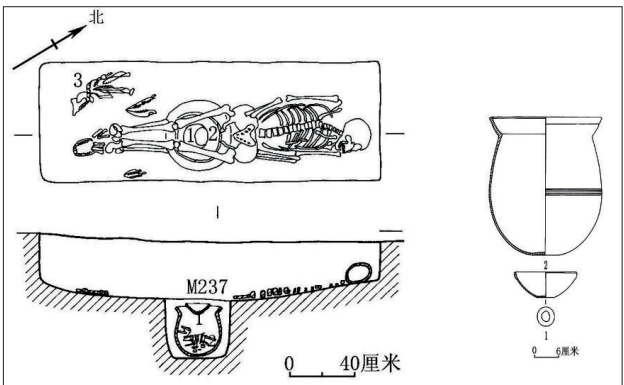
关于史前腰坑葬功能的相关问题，郭志委、李英华、杨华等多位学者已进行过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腰坑墓是瓮棺与土坑墓结合的合葬墓，合葬中的成年个体与未成年个体存在血缘关系，最初来源于女性难产，让婴儿顺利转生，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合葬。第二种观点认为史前腰坑墓的腰坑与祈求女性早繁衍和灵魂不死观念相关。第三种观点认为史前腰坑墓的腰坑属于墓葬奠基仪式的一部分，同房屋或城墙等建筑设施下用婴幼儿奠基的性质相同。

从上述讨论可知，下寨遗址以及汉水中游地区其他遗址所见史前腰坑墓，其腰坑所体现的是一个完整的瓮棺形制，因此在功能上应与瓮棺相同。瓮棺葬的产生是古人“灵魂崇拜”和“再生”观念的具象化。瓮棺的底部或棺盖常有一个刻意的穿孔，一般认为是为了方便灵魂进出的通道，正如云南永宁地区纳西族在安葬死者时，他们“把骨灰袋底部剪开，或抽出底线，使口部和底部均与外界相通。他们说这样便于灵魂出入，在地下扎根，通往阴间。”郭立新认为瓮棺葬是古人对再生的模拟和象征，瓮棺象征受孕的子宫，瓮棺底部或棺盖上的钻孔，不仅代表灵魂出入的通道，也象征着新生儿降生的阴道。下寨遗址史前腰坑墓的腰坑，普遍设置在墓主人盆骨及其周边的下方，该位置正是人体的生殖器官区域，也是新生命降生之处。新生命的诞生也伴随着新的灵魂出现，意味着灵魂也是从此处出入外界。所以下寨遗址腰坑墓将腰坑设置在这个区域，就是方便灵魂通过此处进入腰坑。腰坑内随葬的陶壶和陶钵组合正好作为灵魂的寄居和转生之所，而陶钵底部刻意的钻孔便于墓主人的灵魂从身体进入转世的空间内，促使墓主人转世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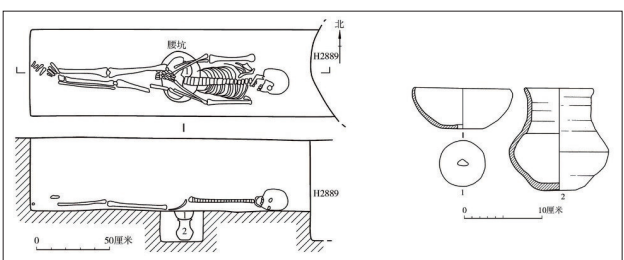
结语

葬俗，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体现，不同的葬俗反映了人们对生死观念的不同解释。下寨遗址的史前腰坑葬应是这一时期先民们对“灵魂崇拜”和“再生”观念的产物，通过在墓主人腰部设置腰坑以及在腰坑内随葬“瓮棺”形式的器物组合，以实现墓主人灵魂不灭或再生的愿景。此外，汉水中游地区其他遗址发现的史前腰坑葬与下寨遗址的史前腰坑葬，虽然在腰坑内随葬的器物组合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整体的葬俗特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表明了这一时期下寨遗址先民们的丧葬观念仍继承了该地区的核心丧葬思想。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龙泉遗址腰坑墓M237平剖面(左)及腰坑内随葬器物组合1.陶钵、2.陶罐(右)



下寨遗址腰坑墓M239平剖面(左)及腰坑内随葬器物组合1.陶钵、2.陶壶(右)

仰韶晚期长筒罐功能刍议

张光辉



图1 运城盐湖附近发现的长筒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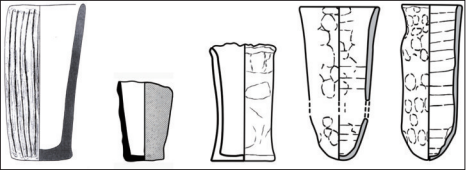


图2 世界其他地区古代盐业储运相关筒形陶容器



图3 尼日尔比尔马筒形盐模及脱模的盐柱

生产体系中形成了一批大同小异的专用陶器，其中，厚胎夹砂盆、釜、碗用于熬煮卤水，大口瓮、罐用以盛储，镂空陶器承担卤水过滤功能，带流器用于加注卤水。除此之外，还发现一类专用筒形陶容器，区别于熬煮、过滤等器具，多用于盛放湿盐、焙制盐锭及成品储运，这类器物造型简洁实用，无二次加装的复杂口沿。如保加利亚东北部普罗瓦迪亚河沿岸铜石并用时代中晚期(4700BC~4350BC)的盐业遗址中，常见的一类圆柱形陶罐，大小不一，大者有高达20多厘米的，小者仅高数厘米。2BC~1BC的法国塞耶河谷有一类大口深腹陶杯，通高大于10厘米(勒洪·奥利维尔、法国摩泽尔塞耶河谷的制盐遗址。欧洲铁器时代的一个原始盐业生产中心。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